

天津工商史料丛刊

第二辑



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天津工商史料丛刊

第 二 辑

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九月

天津工商史料丛刊

第 二 辑

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国家海洋局技术研究所大邱庄联营印刷厂

850 × 1168毫米1/32

5.75印张150千字

一九八四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内部发行 定价0.80元 报刊登记证第310号

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五周年已经到来了，在举国欢庆这一伟大节日的时候，我们以《天津工商史料丛刊》第二辑做为向这个万众欢腾的节假日的献礼！

早在一九六三年，天津市民建、工商联遵循周恩来总理关于搜集历史资料的指示，在天津市委的关怀下，编写并油印了《天津工商史料选集》九册。不意十年浩劫，工作中辍，资料散失殆尽，损失不可弥补。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两会恢复工作。于一九八〇年重新恢复了工商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成立了文史资料委员会，配备了专职干部，并决定编辑出版不定期的内部参考资料《天津工商史料丛刊》。这充分说明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英明路线、方针指引下，我国各条战线，包括文史工作，已经重新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并取得辉煌胜利！

回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民族资本工商业和广大的私营工商业者，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不仅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参加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而且，经过长期的工作、劳动和政治学习，绝大多数原工商业者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翁。这只有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们才走上这样幸福和光明的道路。在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道，热烈地欢庆这一伟大节日！

党一贯重视原工商业者，征集和整理原工商业者在解放前的经历，对研究中国近代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和地方史志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同时，他们在企业管理和生产技术方面的丰富经验也值得参考和借鉴，因此，把原工商业者的亲见、亲闻和亲身经历的历史资料记载下来，传之后代，也是我们两会的一项光荣任务和职责。

一九八三年，市两会的文史工作，在市委领导的关怀下，在两会中央的指导下，两会成员积极参加了文史工作的各项活动。同时在各区两会和热心文史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征集和抢救了许多有价值的工商史料，撰写了民建《大事记》，并着手编写《民建会史》，还出版了《天津工商史料丛刊》，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和鼓励。今后，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在党的关怀下，和各区、县两会共同努力，相信我们的工商文史工作一定会开创新的局面，取得更好的成绩。让我们以搞好我市工商文史工作的实际行动向伟大的国庆三十五周年献礼！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杨天受

建國卅五年

萬眾興隆歡

回顧解放前

顛沛苦難云

須知今日樂

只緣換新王

晚年逢盛世

四化志更堅

實踐証明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社會

主義新中國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旧中國生活

過半個世紀的人深一識得這真理值此中華人

民共和國創立卅五周年之際略抒所感以表慶祝

之忱

何宗謐 天宮年九月

目 录

解放前的天津橡胶业·····	边炳章 (1)
天津染料工业发展概况 ·····	李振江 宋福中 毕敬生 (14)
天津陶瓷业史略·····	高荣彬 程馨山 (27)
天津裱画行业史话·····	牛秉钺 (41)
天津市油墨业发展史略·····	戴宝三 (55)
天津纸箱行业发展概况·····	天津外贸纸箱厂民建支部 (63)
解放前天津“白事”行业见闻·····	老 乡 (74)
同陞和鞋帽店四十五年经营史·····	王耀田 (95)
荣业房产公司与盐业银行·····	陈冰若 (108)
浅谈天津口岸皮张出口的类别·····	庞善廷 (118)
“药刀王”史话·····	王善尧 (125)
天津冬菜六十年产销简史·····	钦 文 (134)
天津包子史话·····	王啸伯 杨春霖 (142)
“万顺成”秫米饭铺·····	雨林 王罗 (145)
“耳朵眼”炸糕简介·····	程馨山 (147)
回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三十年·····	许 钊 (152)
我是怎样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	杨健庵 (163)

解放前的天津橡胶业

边炳章

橡胶工业在我国发展的历史较晚，天津市橡胶工业迄今只有五十多年历史，最初仅是日本商人设立的工厂，直到1938年，才出现中国资本经营的橡胶厂。由于文字记载根据很少，主要依靠回忆记录整理，因此定有不少疏略遗漏之处，尚希读者多予指正和补充。

一、发展概况

天津橡胶工业是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产物。1930年，日人出渊忠次在津创办怡丰橡胶厂，是为第一家。出渊原来经营出口皮毛生意，因赔累不堪，改营橡胶厂，当时资本一万元，设备仅有两台12吋轧胶机，制造五眼胶鞋，用火烤代替加硫，因系独家生产，业务发展很快，每年盈利四、五万元。二、三年后，又从日本买进六台外胎模子，改制自行车外胎，获利更厚。因此引起其他日商觊觎，如原从朝鲜倒运胶底、胶鞋来津贩卖的日商中天洋行，即转业改组为瀚口橡胶厂，其他相继开设的尚有西长、中村、泰山等厂，“七七”事变后，日帝国主义经济势力进一步统治整个华北。又有日商设立福助、兴满、太阳、兴亚、王旗、东亚等橡胶厂，前后共有日商工厂十一家。这些日本资本家通过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对华北橡胶市场的垄断，获得了丰厚利润，扩大了积累，都由开始时期的简陋设备，陆续增添了大型机

器，扩大了生产能力。其主要产品有小型汽车轮胎、自行车内外胎、胶鞋、胶底、机带胶布、胶管等等。产量虽日增，仍难满足市场需要。

当时，中国民族工商业者见到橡胶工业利润较大，向往于此者大有人在。但日本对制造橡胶产品的一切原材物料和技术均严密控制，设厂极难。有些人遂采取与日本商人合作的办法，借助日人势力解决困难。1938年冬，有经营补带胶业的宋德霖及张登弟、张登林弟兄，联合在华美洋行（美商）作事的万辑五等人，集资在意租界开设通兴橡胶厂，是为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家橡胶厂。彼时，请到在日商西长厂作工的贾俊民、李祥霖二人协助，依照日本厂轧胶机式样，自做木样子交双聚成铁工厂代为制造轧胶机。但贾、李二人对制胶技术亦不完全精通，又转介绍西长厂的助理技师日人保田师之助担任通兴厂技师，一方面掌握生产技术，一方面出面购买原料，始得开工制做补带胶、电线胶及胶底后掌等等。同年开业的还有永兴、富记两厂，但都是家庭手工业，没有机器设备，只能以混合胶用煤球炉烤制一些橡胶零件，不能独立生产。

1939年，又有义堂、瑞昌、富盛等厂开业。义堂橡胶厂创办人庞永选，系大连巨商庞义堂之子。庞义堂原系卖豆腐小贩，日俄战争时，他囤积了一批德国狮子牌颜料，发了大财，在大连开设福顺义油厂，主要经营大豆生意，庞永选曾在美国“宾塞维尼亚”大学学铁路工程，归国后就任北宁铁路局天津东站站长及段长，以后又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外事处长等职，与日本军方夙有勾结。卸职后，即拟由大连福顺义调拨资金二万余元伪联币，在天津筹设橡胶厂。但当时伪满政府不准向关内调拨款项，而福顺义因做大豆信贷，与朝鲜银行大连分行有业务往来，结识该分行日本经理的场，以后的场调任天津分行经理，庞永选遂借助他的力量，把这笔款拨汇到津，并另从该行贷借大宗款项，得

以解决建厂资金问题。庞永选还约妥大连日商协盛橡胶厂的职工李春潮来津担任义堂厂的技师工作，由李按照协盛厂的机器式样偷绘图纸，交天津双聚成铁工厂代制轧胶机。1939年大水后，在河东兴建厂房，最初生产补带胶、电线胶，以后添造马靴、运动鞋、力士鞋等产品。

1940年后，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又相继设立裕合、裕德、大陆、聚源、飞龙、永丰、兴亚、北洋、长城、博华、顺隆、双凤等橡胶厂。裕合成立于1939年大水后，创办人系原在日商濰口厂当职员的杨凤藻。杨联络其内亲宗沛然出资三万元，并另约晋信洋行（合记）的股东王养田、魏普钊等人投入一部分资金，又拉来濰口厂助理技师朝鲜人朴寿恩担任裕合技师，筹备工作历时一年余，在1940年开始生产胶底及后掌。大陆厂系中日商人合资创办。中国方面股东系由会川、杨锡誉，他们原来在东北吉林经营鸿顺合号（作布鞋生意并代销沈阳日商大力橡胶厂的元宝雨鞋），1939年7月25日，伪满当局公布法令，所有厂商均成立组合，一般商品限价出售，不准涨价。这样一来，不但鸿顺合业务无法经营，即日商工厂的利润亦受到限制。于是由、杨二人与大力橡胶厂资东日人景藤兵见商妥，双方各出资金十五万元（伪联币），来天津设立大陆橡胶厂，日本股东系以制胶机器作价十五万元入股，中国股东则投入现金十五万元，在河东郭庄子大街兴建厂房，并购买原料，由日人宫崎管理厂务，风光充任技师。1940年开业后，即生产大福寿牌汽车内胎，销路很好。后来由会川等感到流动资金缺乏，又从东北商人梁子元处借到十万元伪联币，条件是：梁由大陆的营业额中提取一分扣佣作为借款利息。1941年冬，大陆厂业务逐渐兴盛，景藤认为有中国人股份，既不能加入日本橡胶组合，也不能多分到橡胶原料，因而想把中国股东一脚踢出，遂提出拆夥要求，并附刁难条件：“不论中日哪方股东接办，都应在原股本之外，再付给对方百分之五十作为资本升

值”。由、杨二人不甘心被排斥，便商请梁子元另招新股东蒋振卿、孙铎生、赵宪辰等人出资三十万元（伪联币），原来中国股东则以厂房设备作价，并另添一部分现款，凑足三十万元，共合资六十万元，将大陆厂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至于日股方面，按景藤所提条件，除将日股及升值部分共作价二十二万五千元（伪联币）外，再多付给数万元作为补偿，景藤即撤出股份。由1943年起，大陆厂完全由中国资本经营。飞龙厂系裕合股东魏普钊出头邀请裕合其他股东宗蕴斋、王养田、王捷帆各出股金二千元筹办起来，由魏普钊之弟魏昶斌担任经理。最初设空摊未生产，其后鉴于日本统制牛皮，制造橡胶轮带可以代替牛皮，遂安装两合22吋手摇平板机，找到六个工人，由裕合技师朴寿恩代出配方摸索试制平带。但朴对做平带也不内行，成品质量很次，其后始约到会做平带的怡丰橡胶厂工人孟义堂协助。孟白天在怡丰上班，晚上偷到飞龙指导生产，因陋就简试制成功，产品终于打开销路，获得不少利润，孟也就脱离怡丰，正式到飞龙厂担任技师，以后又扩充厂房设备，添制三角带，逐步发展起来。长城系回民穆姓独资创办。穆家原经营长源合商号，历史悠久，资本雄厚，经营出口牛皮牛骨，并在河南、山东两省代销美孚煤油，获利很大。“七七”事变前，又利用出口不合规格的次皮作为原料，开设长源合制革厂，也很得利。“七七”事变后，日本统制牛皮，制革厂无法生产；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美孚煤油来源断绝，长源合业务陷于停顿，于是穆家以全部资力投入工业筹设长城橡胶厂，由穆伊光担任经理。1942年正式生产再生胶底。1947年又改制三角带，主要行销东北一带。1942年到1945年间，利兴、利群、协成、万源、富德、同心、东昌、恒兴、光华、华胜、春生、钰华、德盛等橡胶厂相继设立。截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天津民族资本经营的橡胶厂已达三十家。这些厂的一般特点是资金少、规模简陋、技术条件差。如坚耐斯橡胶厂经理王鹤儒，原在

怡丰学徒，后来当了工头，利用晚上时间在家中制做“坚耐斯”牌传动带和三角带，同时并担任平垣厂的技术顾问，积攒一些钱，又开设振兴橡胶厂。聚源橡胶厂翟菊林，开始只雇佣一个工人，用煤球炉烤脚蹬皮，卖给日商同井洋行，以后才发展到数十工人。还有些厂则存在时间不长，如北洋开业不足一年即倒闭。

二、在日伪统治下挣扎图存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经济命脉被日人所控制，中国民族资本家更受到种种歧视和限制。当时橡胶原料是由日本物资开发公司配给，由日本橡胶组合严密控制，中国厂商如欲购买橡胶，必须以日本人名义向日本橡胶组合提出申请，但既使配售一部分，其数量亦极为有限，而且还受日人的各种挟制。其他各种配合剂，亦只能以高价从日商藤泽友吉商店购买。在技术上，日本橡胶厂对橡胶配方及操作技术更是严格保密，其调剂、配方的工作室，绝对不准中国职工进入，在日本橡胶厂工作的中国人，往往在厂十几年，尚不知“亚铅华”为何物，更不必说了解其物理性能。有些中国职工则采取偷艺办法。在日商濑口、中村、西长等厂当职工的杨凤藻、肖志新、时建民、王鹤儒、翟菊林等人则系偷偷学到一些技术，然后自己开设了裕合、志新、中南、振兴、聚源等橡胶厂。还有曾在日本橡胶厂工作的孟义堂、王树林、李春潮、任安秀等人，则分别到中国人经营的飞龙、义堂、长城等厂充当技师。但他们在掌握生产上，有时仍感无把握，不得不直接仰赖日本技师，以致受到挟制。如通兴橡胶厂原约日商西长厂工人贾俊民协助技术，贾向西长厂辞工，竟触怒日本经理，唆使日本警察署特务对贾进行搜捕，以致贾有数月之久不敢进入日本租界。后贾又转介绍日人保田师之助充当通兴技师，经理万辑五等，除给保田以高薪，许以25%红利和供给小灶伙食

外，并资助其回国结婚，保田后来将眷属接到天津，厂中复提供宿舍，万辑五并亲自招待保田之岳父母游览北京名胜，原想其或能为厂出力，不料保田竟抓住万等不懂技术的弱点，大权独揽，百般要挟，一度曾在厂内悬挂日本国旗，意图霸占，最后公然盗窃，将原材物料拉走一大车。当时通兴厂因系设在意租界，遂借助意工部局势力向日本租界警察署交涉，结果由保田退回一部，而由通兴厂付给保田一笔解雇费作为了结。又如瑞昌橡胶厂经理孙伯良，以高价向日商中村厂技师通井收买配方，生产三轮平带。不料营业好转后，通井却起了霸占瑞昌厂的野心，孙伯良费尽心机始应付过去。又如大陆橡胶厂技师日人风光，将各种配合剂都编成号码，在指挥中国学徒工配料操作时，不告以化学名称，只告号码，以后风光退出该厂，徒工仍只能照号码配料。再如在濠口厂工作的杨凤藻，用向日本技师高原和朝鲜人助理朴寿恩拉拢行贿办法，偷学到一点技术，在杨离开濠口自办裕合时，将朴寿恩拉来协助，但濠口厂日本经理渡边一平竟到裕合厂说杨拆了他的台，威胁不准开业，并说：“再要干就送到日本衙门”杨当时未为所动，渡边又指使日本警察署派日警官来到裕合，用软硬兼施办法叫杨和朴别干裕合仍回濠口，杨凤藻遂聘请日人管沼笃一充当裕合顾问，并通过管沼和日本宪兵队司令福田拉上关系，经常请客，才得以抵制渡边的威胁。

制造胶鞋所需之溶剂汽油，为日本军用物资，严禁中国人买卖。飞龙厂为保证生产，从黑市陆续买进汽油二百五十多桶，藏在裕合后院夹壁墙内，不料有人向日本告密，清水部队即派宪兵前往查抄，不仅将汽油全部没收，还将裕合经理刘邦周逮走。杨凤藻为此事请托日本顾问管沼及其老师、日本退伍军人志村（当时任极管区嘱托，即日本接收的旧英租界的顾问），由志村向其婿、极管区司令佐藤说项，马上就将裕合厂启封，并将刘邦周释放，所没收的汽油大部分作为向日军“献礼”，其一小部分约

五、六十桶则发还给飞龙厂，以表示“善意”，而飞龙厂则前后经杨手向志村等请客送礼，共用去伪联币数千元。飞龙受此挫折，大受影响，遂采取现买现用办法，不敢再存汽油。其他中国厂没有门路，更不敢购买汽油，只能以水浆子代替。

在产品销售方面也受到日本厂的很大排挤。如青岛日商B.S.厂生产的汽车内胎，每条售价一百余元。后来天津大陆生产大福寿汽车内胎，每条定价四十余元。B.S.厂为与大陆竞争，竟将价格逐步落至十七元，大陆以不敷成本，只好降低质量改为大象牌，每条售价十五元。B.S.厂再进一步落到十二元，大陆厂因无力再与之抗衡，只好改产胶鞋。B.S.厂在取得胜利后，又将汽车内胎恢复原来售价。而大陆改产大福寿胶鞋后，因原料困难，只能以再生胶、土布、水浆子代替生胶、帆布和汽油，作出成品一穿就裂，更难与日本厂竞争。至于一般小厂因缺乏机器设备，依靠手工操作，更不能独立生存，有的就沦为日本厂的附属车间地位，代做加工，苟延残喘。

三、抗战胜利后畸形发展

1945年抗战胜利，原以为“祖国光复”，可以否极泰来，不料为时不久，幻想即告破灭。当时十家日本工厂均被国民党政府接收，其中中村厂改为“后勤橡胶总厂”，福助厂改为“后勤分厂”，怡丰厂改为“交通部汽车修配厂”，兴亚厂改为“宇宙宏轮胎翻修厂”，均由国民党官僚资本经营。名为恢复生产，实际只是改换厂名，很少生产。在管理上美其名曰“军事化”，更是漆黑一团，由厂长到职员集体贪污，上下其手，公然盗窃，分赃自肥。特别是在残酷剥削工人方面，和日本帝国主义毫无轩轻，工人工资收入由于通货膨胀影响，甚至不能维持个人生活，每天在饥饿线上挣扎。

除以上几个厂外，其他如日商泰山、濰口、西长、太阳、王旗、东亚、兴满等厂，则由国民党政权接收后交“敌伪产业处理局”标售。在标售以前，国民党政府早把这些厂的流动资金、积存原料及运输工具等全部抽走和盗卖，只余厂房和固定设备进行投标。大小贪官污吏更趁机勾结商人，以泄露标底或拖欠标金办法，从中取得好处，共同瓜分。如后来的大中华、新天津、震中、冀新、统一等橡胶厂，都是“敌伪产业处理局”标售的日本橡胶厂。新天津厂系华信银号股东以法币两万一千元将泰山厂标买过来，原来动机是想转手获利，后来见到生产利润很大，才改变主意开工生产。冀新厂经理刘克庵，原来经营广昌棉布庄，胜利后以投机所赚一千七百匹大五福棉布标购西长厂。另外，敌产兴满橡胶厂，被国民党天津市政府抢先劫收，当时国民党军需署也在争先霸占敌产，国民党天津市长张廷谔怕到口肥肉被人抢走，遂将厂名改为第二化学厂，作为掩护，后来又移交给“敌伪产业处理局”于1947年下半年登报标售。彼时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在上海已控制十个企业单位，还想垄断全国的橡胶产品生产，该公司总经理吴泽生原来想标购青岛日商仓口橡胶厂（即B·S·牌），结果被宋子文抢购而去，吴又看中天津兴满厂，得到标购消息，立即飞到天津以相当于160条黄金的标价得标。这时上海正泰橡胶厂亦想以高于大中华标价一倍的价格，争购兴满厂，不料来迟一步，已过开标日期，只好作罢。在开标前，天津橡胶同业公会理事长庞永选得悉大中华已投标，惟恐兴满厂规模大、设备新，一旦被大中华据有，即有被大中华吞没的危险，拟联络同业集资标买，终以资力不足，未能如愿。在大中华尚未交款接收厂房前，突有兴满厂朝鲜资方以该厂产权系朝鲜人所有，不同意按敌产处理，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控诉，直到一年后的1948年下半年，才判决仍归“敌伪产业处理局”标售，但此时法币贬值，金价上涨，大中华只以不到二十条黄金的代价就付清原标价款，

从中取得莫大好处。

日本投降之初，橡胶可以自由进口，加之国民党当局在接收日本橡胶厂后，将其存胶大量标售，故一时原料充裕。同时，市场对橡胶制品的需要量也较大，因而有不少商业资本家及握有游资的人，贪图优厚利润，相继投资设厂，一时新橡胶厂的设立如雨后春笋，仅1946年一年，就有广兴、志新、中南、兴华、中国、振兴、南洋、新天津、震中、震海、天太祥、源太、环球、义胜、中华、冀新、信成、裕成、华英等十九户开业，相当于1945年实有户数约63%。1947年，国民党政府实行进出口贸易管制，橡胶原料不准自由进口，改由政府配给外汇交同业公会掌握分配，当时黑市价格与分配价格悬殊，转手可获厚利，因此竟有的专为分得橡胶再转手出卖牟利而设厂。如经营义隆车行的贾杰卿，即因此开设了中国橡胶厂，虽安装两台14吋轧胶机，根本不开工生产，每次分到橡胶，即以黑市价格卖给钰华橡胶厂，大得其利。在1947到1948年，新开业的又有建业、信隆、嶽华、华北、三泰、新生合、东方、祥太、斌记、国光、庆生、珍记、国华、荣华、震华、中兴、太东、统一、德孚等十九户。到解放前夕，天津市橡胶厂共有六十六户，职工人数一千三百十一人，轧胶机一百五十五台。从表面上看，较之敌伪时期在技术水平上似有所提高，产品品种及产量也有所增加，一般橡胶制品均能制造。但究其实际则生产经营一片混乱，呈现虚假繁荣。资金雄厚的大厂，多做囤积原料、投机倒把生意。有的则操纵行情，垄断市场，如钰华橡胶厂生产的自行车外胎，最初冒充日本B·S·牌在市场行销，大获其利。一些小厂多被其排挤，如平垣橡胶厂原来顺销的平面型自行车外胎，即被排挤出市场。以后钰华将假B·S·改为胜利牌，仍然独霸市场，每日开盘成交，成为投机对象。同时，一般小厂资金薄弱，在通货不断恶性膨胀的情况下，卖出产品，买不进原料，经营日感困难。如振兴橡胶厂规模很

小，生产的平带、三角带都通过五金行代销。五金行消息灵通，每当行情看涨，即向振兴订货，先交50%价款，及至履行合同时，原料已上涨很多，振兴为维持往来信誉，只得赔本交货。在国民党统治后期，则无论大小厂均感无法经营，如大陆厂，原来生产胶鞋，1948年国民党发行金元券时，对工业产品实行限价政策，每日有伪警宪特强按牌价成箱购买，该厂不堪亏蚀，只有停工辍产，在黑市倒卖黄金、外币、大布、食粮、杂货等等，竟由工厂而成为投机倒把商。又如富德橡胶厂给铁路局订做五十根胶管，预收订金五成，交货后，由于物价暴涨，领到全部货款却赔出三、四吨橡胶。又如裕合橡胶厂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从账面看有很大盈余，但从所存实物看，胜利初期，厂内最多存十一吨橡胶，而到解放前夕，只余二至三吨橡胶，其余均赔光，因此人们都说，国民党时期的工业是“赚钱赔本的买卖”。整个橡胶业气息奄奄。

四、同业公会的成立

敌伪时期，华商橡胶厂为了解决原料问题，想联合起来从日本开发公司取得配给橡胶权利，于是由义堂橡胶厂经理庞永选联络中国同业，于1942年4月组成橡胶工业同业公会，有义堂、大陆、通兴、永丰、裕合、兴亚、歙华、华北、恒昌、瑞昌、双凤、顺隆等十二家橡胶厂入会为会员。庞为人圆滑，又与敌伪夙有勾结，故公会一经成立，他就被公推为董事长，公会办公地址即设在义堂厂内。经庞与日本人联系，每月能取得少量橡胶配给额，但在分配时，义堂和大陆两厂却占去总额的67%，其余33%才分配给其他十家，根本不敷需要，仍须从黑市购买橡胶或使用再生胶生产。彼时，庞还借用公会名义联合日本橡胶组合，共同向日本华北开发公司申请批准从南洋进口橡胶。庞曾通过德商禅